

# 家庭與社會對青少年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石泐、王乃琳\*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本研究主要探討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對青少年幸福感的影響，並比較性別上的差異。研究資料取自「2019 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的原始資料，以家庭支持為自變項、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為中介變項、幸福感為依變項，並以性別為調節變項。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幸福感會受到家庭支持和社會參與的影響，但不會受到不當對待行為的影響，而且此一模型在不同性別間具有恆等性，研究者據此提出結論和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幸福感；社會參與；家庭支持；性別差異

## 緒論

近年來，幸福感（well-being）已日益受到各國政府重視，人民的生活福祉不單追求物質上的滿足，更尋求全方位的滿意感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11 年提出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 BLI），用以測量該地區居民的幸福程度，這是第一個跨國的幸福測量指標（OECD, 2013）。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2012 年開始參照 OECD 提出的 BLI，併列國際指標與在地指標調查台灣國民幸福指數，內涵包括物質生活條件和生活品質兩大面向（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在方法上同時兼顧了主觀與客觀的測量，足見幸福感在近年已成為國民生活福祉的重要衡量依據。

過去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大多以成年人或老年人為主要對象，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工作能力，經濟上能自給自足。然而，幸福感並不僅限於特定的人口群，社會上每個年齡層都可以感知和測量，但由於不同年齡層的生活型態和重心有差異，因而在幸福感的感受上亦有所不同。以青少年為例，他們雖然不必為經濟生活、居住環境、工作收入而煩惱，但是在日常生活和生涯發展上仍必須面對課業、同儕、家庭手足、

---

\* 通訊作者：王乃琳（[nailin@g2.usc.edu.tw](mailto:nailin@g2.usc.edu.tw)）

父母及師長，有着不一樣的壓力和煩惱，因而聯合國亦開始視青少年的幸福感為應持續達成的目標之一（United Nations, 2019）。

隨着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問題增加（NHS Digital, 2018），各界對改善青少年幸福感和福祉的關注度亦隨之增加（Gillett-Swan, 2014）。為進一步了解影響青少年幸福感的保護因素和風險因素，本研究探討可能影響青少年幸福感的家庭和社會因素，期能將研究結果作青少年輔導工作和未來社會福利政策規劃的參考。

## 幸福感對青少年的意義和影響

幸福感是個錯綜複雜的概念，Diener（1994）指出幸福感是種主觀的感受，個體根據自己的標準對其生活品質作整體評價，內涵包括正、負向的感受（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s）和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Diener 認為幸福是一種長期愉悅的正向情緒、無負面感受、對整體生活感到滿意。Ryff & Keyes（1995）認為幸福感不單是對生活感到幸福和滿足，還包括積極的自我尊重、對周圍環境的掌握能力、與他人的社會關係、個人持續不斷的成長與發展、生活有目的、有自主的能力。過去研究指出，與親近的人（例如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時光可以豐富個人生活、增加積極的情緒（Pavlova et al., 2014），並可提升主觀幸福感（Zhang & Zhang, 2015）、減少憂鬱症狀（Glass et al., 2006），令人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Gennings et al.（2021）從三個向度解釋青少年的幸福感，包括：整體論（holism）、正向感受（positive feelings）、外在影響因素（external influences）。整體論認為青少年的幸福感是廣泛、多面向和複雜的結構（Dunlop-Bennett et al., 2019; Huppert & So, 2013），這些不同的面向彼此關聯且互相影響（Boyko et al., 2017; Dodge et al., 2012; Lijadi, 2018）；由於幸福感有多維的性質，因此常與其他概念互換使用，例如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交錯使用（Bowling, 2017; Dodge et al., 2012; Goodman et al., 2018; Kelly, 2018）。而在正向感受的觀點下，Dodge et al.（2012）指出青少年的幸福感是一種正向的感受，這種感受是幸福感的內在本質，與個人的富足感受有密切關係，亦包括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和擁有的幸福。最後，外在影響因素亦是形成青少年幸福感的重要原因，許多外在事件都被證實會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包括建立連結關係的重要性、沒有孤獨感、生活經歷對其價值觀和重要事件評價的影響等（Gennings et al., 2021）。另外，Fattore et al.（2007）認為影響青少年幸福感的因素有五個，包括：自主和行動性、安全和保障感、自我的正面感受、物質充足性、物理環境及住家的安全性，當中就包含了外在的家庭和物理環境，顯見幸福感是多因素交錯下的感受。

## 家庭對青少年幸福感的影響

一般來說，成年人的幸福感與父母或家庭的相關性較低，家庭對人們雖然重要，但隨着個人的成熟，成年人對於父母或家庭的依賴會相對減少(Gennings et al. 2021)。但對青少年而言，家庭與幸福感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原生家庭對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根據 Maslow (1943) 的需求階層理論，第一階層中良好的居住環境提供個人舒適、安全和與社區的連結感，是最重要的生物和生理需求之一，而這種舒適、安全和連結感通常源自於父母與家庭的支持(Gennings et al., 2021)。Bjarnason et al. (2012) 的研究發現，生活在完整家庭(intact family)中的兒童及青少年(下稱「兒少」)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較高，而居住於分居家庭中的小孩，其幸福感相對較低。陳佳汎、陳若琳(2007)認為孩子若知覺父母的親密度愈高，則其感受到的幸福感亦愈佳，顯見家庭對兒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青少年得到父母與家庭的支持是令他們感受到幸福的重要來源，他們甚至認為家庭關係比友誼更為重要(Gennings et al., 2021)。根據過去研究發現，兒少在選擇與朋友出去玩和與家人相處時，他們更重視與家人共度的時光以及家人的陪伴和支持(Bennett et al., 2009)，年幼的孩子更依賴家庭所提供的支持(Bharara et al., 2019; Dunlop-Bennett et al., 2019)。Flouri & Buchanan (2003)認為父母願意花時間陪伴青少年，與其談論日常生活或學校生活中的事情，將有助於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陳憶、陳柯玫(2020)的研究發現，家庭關係的良窳會影響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青少年與家庭的關係愈佳，其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愈高。許婷婷、林惠雅(2011)認為青少年知覺母親的溫情引導和信任溝通對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顯著正向的解釋力，但疏離的母親依附和嚴厲的教養則對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有負向的解釋力。陳冠妤、陳若琳(2019)進一步指出青少年與父母依附關係中的信任和溝通，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但疏離則與幸福感有負相關。換言之，青少年與父母間的依附關係對其心理健康有顯著的關聯，青少年與父母的依附關係愈正向，則其感受到的幸福感愈多(王櫻芬、連廷嘉, 2012; Love & Murdock, 2004; Webster, 1998)。

由此觀之，成長中的青少年處於 Erikson (1963, 1987, 1994)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和角色混淆危機當中，家庭通常是青少年的後盾，家庭關係和家庭支持都被認為有助於提升幸福感，因而本研究將家庭支持視為預測青少年幸福感的自變項之一。

## 社會環境對青少年幸福感的影響

根據前述整體論的觀點，幸福感是廣泛、多面向且複雜的結構(Boyko et al., 2017; Dodge et al., 2012; Lijadi, 2018)，除了家庭因素對於青少年的影響之外，社會環境亦

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Gennings et al., 2021），例如社會對青少年的不當對待行為（maltreatment）就會影響到他們對幸福的感受。

不當對待行為包含對於兒少的虐待和忽視，甚至是霸凌行為，這是嚴重的公共衛生議題，這種不良經歷對兒少的健康和幸福感會產生長期的影響。兒少的不當對待行為包括父母、看護人或其他監護人（例如宗教領袖、教練、教師）及同儕對 18 歲以下兒少所有類型的虐待和忽視，這些虐待和忽視行為會導致傷害、潛在的創傷，或威脅他們的成長。常見的不當對待行為有身體虐待、性虐待、情緒虐待、忽視共四類：身體虐待是故意使用可能導致身體傷害的力量對待兒少，包括打、踢、搖晃、燒燙傷或其他針對兒少的暴力展現；性虐待涉及威脅或強迫兒少進行性行為，包括撫摸、插入和要孩子接觸其他性活動等行為；情緒虐待是指損害兒少自我價值或情緒健康的行為，包括辱罵、羞辱、拒絕、隱瞞愛和威脅；忽視則是未能滿足孩子的基本生理和情感需求，包括獲得居住、食物、衣服、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對兒少的不當對待行為目前非常普遍，在 2019 年美國至少有七分之一的兒童遭受過虐待或忽視，更有 1,840 名兒童因虐待和忽視而死亡，而且這很有可能是低估了的數字（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2021）。

在台灣，平均每天有 80–100 位孩子疑似遭受虐待（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另外在校園裏，12–17 歲的青少年是所有年齡層中最容易遭受不當對待的族群；以 2020 年為例，校園性侵害事件中 12–17 歲青少年佔 69.1%（201 件）、校園性騷擾事件佔 60.6%（1,725 件）、校園性霸凌事件佔 80.3%（65 件）（教育部統計處，2021）。另外，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7）的調查報告顯示，校園霸凌事件主要以關係霸凌為主（佔 81%）、肢體霸凌次之（佔 28.9%），而且男生接觸到肢體霸凌和性別霸凌較高，女生則以關係霸凌為主，所有的霸凌事件發生以 12–15 歲國中時期最多，有三成二的家長表示孩子在學校有接觸過（包含疑似）霸凌事件，而且有三成家長表示學校並沒有積極處理。由此觀之，台灣的兒少不當對待行為仍如冰山一角，它對兒少所造成的身心影響更不容小覷。

## 青少年的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social participation）的廣泛定義是一個人參與社會活動或是與社區中的其他人互動（Ang, 2018; Julien et al., 2013），是和家庭以外的人所進行的互動交流行為（Goll et al., 2015）；社會參與同時亦包含個人在小型社會中的積極參與（例如與朋友、同學），或在大型社會的互動、工作環境的互動（Kessler et al., 2009）。Erikson（1963, 1987, 1994）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以「自我認同」為青少年時期最重要的發展要務，青少年藉由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參與，除了可以建構自我的意象外，更能習得社交的技巧。

過去有關社會參與對個人幸福感的研究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皆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社會參與被認為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重要因子（Helliwell & Putnam, 2004; Takahashi et al., 2011; Yamaoka, 2008; Yeary et al., 2012）。人際交往對於幸福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們需要感受到被愛和被關心（Foley et al., 2012; Putnam, 2001; Ryan & Deci, 2001）；這亦呼應了 Maslow（1943）需求理論的第三階層，即愛與歸屬感的需求，此需求的根本是社會連結和人際關係，有助於達成個人的自我實現。人們憑藉着與他人的連繫來感受許多不同的正向情緒，假如沒有這些連繫，人們便會感到孤獨和孤立（Seligman, 2011），這些孤獨和孤立的感受與消極的心理和身體健康高度相關，同時亦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Courtin & Knapp, 2017）。社會互動已被視為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2008; Seligman, 2002）。理論上，社會參與可視為緩衝心理功能下降的一種保護性因素（Hertzog et al., 2008），同時亦緩衝了情緒健康（Gilmour, 2012）與身體功能（Graney & Zimmerman, 1981）的下降。

### 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和幸福感的關聯

從上述可知，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皆會對青少年的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然而，此三變項是在甚麼情況下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要回答這問題，首先必須了解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之間的相互關係。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Bronfenbrenner, 1979, 1986）以情境主義的角度提出了多層次的發展模型，強調多層次情境對於兒少和家庭影響的重要性。根據這個模型，家庭系統被嵌入到更大的環境中，從直系親屬延伸至更大的社會環境，例如社交網絡和社區參與。因此，青少年本身家庭系統的健康狀態可能會受其社會參與的網絡互動，以及社會環境對於青少年的不當對待的影響，進而對青少年的幸福感產生作用。

過去研究指出，家庭功能（例如互動、支持、穩定性、靈活性和家庭角色）較差的家庭出現不當對待行為的機率比一般普通家庭來得更高（Paavilainen et al., 2001），不良的家庭狀況在出現兒少不當對待行為之後，意味着兒少幸福感的消失。為了防止兒少不當對待行為的發生，促進家庭關係與家庭支持是重要的條件之一（Lepistö et al., 2017），家庭功能與家庭環境是兒少不當對待的風險因素（Child Family Community Australia, 2017），有效提高父母的教養技能並提升家庭對子女的支持，可以降低不當對待風險因素的嚴重程度（Daro & Benedetti, 2014; Prinz, 2016）。

另外在社會參與部分，家庭同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母的態度通常會決定子女在外活動的行為，當父母支持和鼓勵孩子參與課外活動時，孩子會更早進行社會參與活動（Ng et al., 2008）。雖然能夠確定家庭環境對於青少年社會參與的影響，但只有家庭的高度支持才能顯現出其對青少年社會參與的效果。具體而言，高度支持的家庭

會令青少年更加樂觀和開放，家庭支持程度愈高時，對青少年積極參與社會團體提供了有利的環境（Csikszentmihalyi & Schneider, 2000），進而提升青少年的幸福感。

由此觀之，家庭的支持對於青少年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且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亦會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換言之，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介於家庭支持與幸福感之間可能存在中介效果，因而本研究將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視為中介變項來探討。

## 性別的差異比較

根據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國際大型調查結果顯示，幸福感於不同性別有很大差異，女性處於與男性相似的環境中時，她們對自己的生活更滿意；倘若女性生活在比男性更差的條件時，她們仍然比男性更快樂，其幸福感亦較高（Boarini et al., 2012; Kapteyn et al., 2009），在本土研究中，吳枚瑛等（2018）、鄧清如、陳昭儀（2010）亦有相同發現。然而，林惠雅、林麗玲（2008）、陳冠好、陳若琳（2019）、劉麗芳、陳志賢（2021）、DeNeve & Cooper（1998）的研究卻有不同結果，認為不同性別青少年在幸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

家庭對於兒少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的影響亦可能存在性別差異，翁敏甄、陳嘉成（2018）發現父母的關懷是影響青少年整體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父母對於女生的影響力大於男生。至於在不當對待行為上，男孩和女孩在家庭中遭受身體暴力的可能性相同，但男孩更容易受到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忽視，女孩比男孩更容易遭受性暴力（May-Chahal, 2006）。在社會參與上，Fletcher et al.（2000）指出，父母給孩子設定的行為模式以及他們與孩子的相處方式，都會影響孩子在課外活動上的參與意願，而且在性別上產生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幸福感在不同性別的青少年當中可能存在差異，因而本研究將以性別為調節變項進行分析。

##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取自「2019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原始資料進行分析，該調查是以台北市12個行政區域為主要範圍，調查對象為台北市6歲以上至未滿18歲的兒童及少年，抽樣方式依台北市行政區分為12個副母體分層，再依照兒童及少年人口數比例分配樣本數而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問卷調查於2019年9月至10月底進行，

6 歲以上至未滿 12 歲的兒童獲得 1,473 份有效問卷，12 歲以上至未滿 18 歲的少年獲得 1,525 份有效問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本研究擷取其中 12 歲以上少年問卷的原始資料並刪除作答不完整的問卷後，得到有效問卷 1,328 份，其中女生佔 48.5%、男生佔 51.5%。

##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依據前述文獻以家庭支持為自變項、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為中介變項、幸福感為依變項、性別為調節變項，依照研究架構擬出研究假設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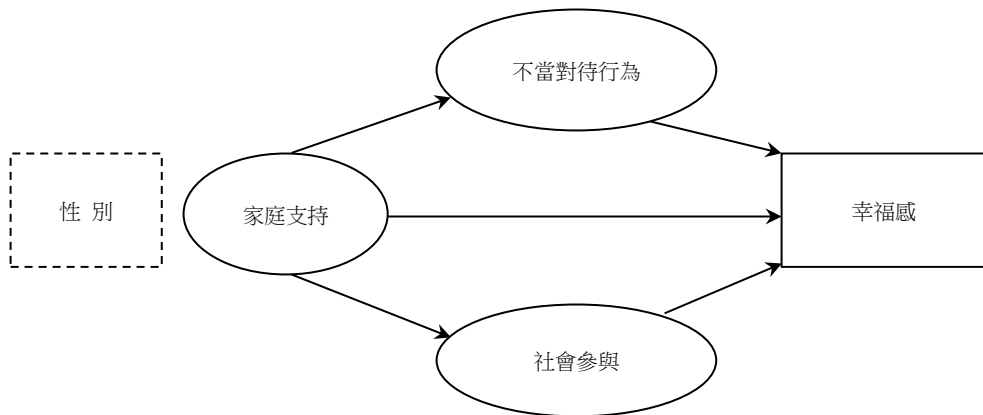
H<sub>1</sub>：家庭支持會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

H<sub>2</sub>：家庭支持會影響青少年的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

H<sub>3</sub>：家庭支持會透過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間接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

H<sub>4</sub>：不同性別群組在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對幸福感的影響方面具有恆等性<sup>1</sup>。

圖一：研究架構



## 測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家庭支持」是指主要照顧者會對青少年讚美、在犯錯時與其討論、聽其表達意見等，共計 3 題，回答選項從「都不是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常常這樣」、「都是這樣」各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家庭支持愈多。「不當對待行為」是指青少年被霸凌、被性騷擾、遭受家庭暴力等行為，共計 3 題，回答選項從「完全沒有」、「1 至 2 次」、「3 至 4 次」、「5 至 6 次」、「7 次以上」

各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遭受不當對待行為愈嚴重。「社會參與」指青少年在學校擔任幹部、透過管道表達意見、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等行為，共計 3 題，回答選項從「都不是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常常這樣」、「都是這樣」各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社會參與程度愈高。「幸福感」主要詢問青少年在台北市生活的幸福程度，回答方式由 0 至 10 分給予評分，分數愈高表示幸福感愈好。經由統計後，受訪青少年家庭支持平均得分為 3.63、不當對待行為平均得分為 1.05、社會參與平均得分為 2.84，幸福感平均得分為 7.55（詳見附錄）。

##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資料分析。由於一般多元迴歸假定每一對變數間存在線性關係，兩者間的關係可以直線方程式來表示。SEM 則是結合多元迴歸和因素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的幸福感與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有關，其中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在本研究中是中介變項，此中介效果（mediating effect）的分析採用 SEM 較為恰當，故本研究採用 SEM 進行資料分析，並透過 AMOS 25.0 進行資料處理。

## 研究結果

### 測量模式檢驗

SEM 由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所組成，在執行結構模型評估前應先進行測量模型檢驗，若測量模型配適度可以接受，再建立完整的 SEM 模型，如此資料與模型的相符程度就會提高（Kline, 2005）。測量模型是否存在違犯估計的檢驗主要是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行，本研究三個構面的 CFA 分析結果如表一所示。由表中可知，所有題目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扣除設定為 1 的觀察變數外，其餘皆在 .4 以上且達 .001 的顯著水準。在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上，Fornell & Larcker（1981）建議應大於 .6，本研究三個構面的 CR 值介於 .661 至 .826。至於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Hair et al.（1998）認為 AVE 的值應大於 .25，本研究則介於 .396 至 .613。整體而言，藉由測量模型檢驗後發現模型並未有違犯估計現象產生。

進一步進行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檢驗，以檢驗不同構面的相關在統計上是否存在差異；通常以 AVE 平方根與構面的相關係數作比較，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若小於所對應構面 AVE 的平方根，表示同構面的內聚力強、不同構面間區隔性高，



表一：潛在構面信度分析

構面	指標	未標準化 負荷量	SE	t 值	標準化 負荷量	SMC	組成信度 (CR)	AVE
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 1	1.000			.728	.530	.826	.613
	家庭支持 2	1.203	.049	24.796***	.820	.672		
	家庭支持 3	1.148	.046	24.740***	.797	.635		
不當對待行為	不當對待 1	1.000			.566	.320	.661	.396
	不當對待 2	1.111	.088	12.687***	.690	.476		
	不當對待 3	0.753	.057	13.105***	.625	.391		
社會參與	社會參與 1	1.000			.498	.248	.774	.551
	社會參與 2	1.931	.138	13.990***	.974	.949		
	社會參與 3	1.347	.078	17.256***	.675	.456		

\*\*\*  $p < .001$

顯示區別效度存在 (Fornell & Larcker, 1981)。表二中對角線粗體字為各構面 AVE 值的平方根，其餘非粗體字則為各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表中各構面的相關係數絕對值介於 .045 至 .305，AVE 平方根則介於 .629 至 .783，AVE 平方根均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數，顯示各構面的區別效度極佳。

表二：構面的區別效度

構面	項目數	1	2	3
1. 家庭支持	3	<b>.783</b>		
2. 不當對待行為	3	-.236	<b>.629</b>	
3. 社會參與	3	.305	-.045	<b>.742</b>
平均數		3.632	1.046	2.842
標準差		0.923	0.261	0.991

註：對角線粗體字為 AVE 平方根。

## 結構模式檢驗

模型配適度在應用 SEM 作理論模型的驗證時是必要條件，配適度愈好代表模型與樣本愈接近。從表三模型整體配適情形可知，本研究建構的測量模型卡方值為 94.495， $p$  值等於 .000，拒絕虛無假設。但由於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影響，故採用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 (Normed Chi-square, NC) 來判別，本模型中 NC 值為 3.048，符合 Schumacker & Lomax (2004) 應小於 5 的標準。在絕對配適指標上，Henry & Stone (1994) 認為 GFI 和 AGFI 理想要求標準應大於 .90，本研究中的數值分別為 .986 和 .975。在 RMR、RMSEA、SRMR 的檢驗上，Hu & Bentler (1999)、McDonald & Ho (2002) 建議應低於 .08，本研究數值分別為 .046、.039、.036。在增值配適指標上，

Schumacker & Lomax (2004)、Hu & Bentler (1999) 認為 NFI、NNFI、CFI、RFI、IFI 值應大於 .90，本研究數值分別為 .973、.974、.982、.961、.982。在精簡配指標上，Mulaik (2009) 認為 PNFI、PGFI 數值須大於 .50 的標準，本研究數值為 .670、.556。整體而言，本研究所建構的測量模型在各項配適度指標中均符合標準，模型配適度良好，再加上本研究的樣本數量龐大，在不同性別群組上樣本數並未有太大差異，故以下將不採用 bootstrapping 法進行分析處理。

表三：模型配適度檢定結果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檢定結果
絕對配適指標	$\chi^2$	94.495 ( $p = .000$ )
	$\chi^2/df$	1-5 之間
	GFI	> .90
	AGFI	> .90
	RMR	< .08
	RMSEA	< .08
	SRMR	< .08
增值配適指標	NFI	> .90
	NNFI	> .90
	CFI	> .90
	RFI	> .90
	IFI	> .90
精簡配適指標	PNFI	> .50
	PGFI	> .50

本研究結構模型的路徑結果如表四和圖二所示，其中家庭支持會直接影響到幸福感，其標準化係數 ( $\beta$ ) 為 .314 ( $t = 9.648, p < .001$ )，研究假設 H<sub>1</sub> 成立。而家庭支持亦會直接影響到青少年的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其標準化係數分別為 -.236 ( $t = -6.117, p < .001$ ) 和 .306 ( $t = 8.371, p < .001$ )，研究假設 H<sub>2</sub> 成立。

在家庭支持對幸福感的中介效果分析上，前述可知家庭支持對幸福感、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都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而社會參與對幸福感達顯著影響 ( $\beta = .118, t = 4.019, p < .001$ )，但不當對待行為對幸福感則未達顯著，顯示家庭支持會透過社會參與間接影響幸福感，但不會透過不當對待行為為影響幸福感，研究假設 H<sub>3</sub> 部分成立。若以標準化影響效果來看，家庭支持對幸福感的總效果為 .354、直接效果為 .314、間接效果為 .041，其中藉由社會參與來間接影響的效果為 .036 (即  $.306 \times .118$ )，顯示社會參與介於家庭支持與幸福感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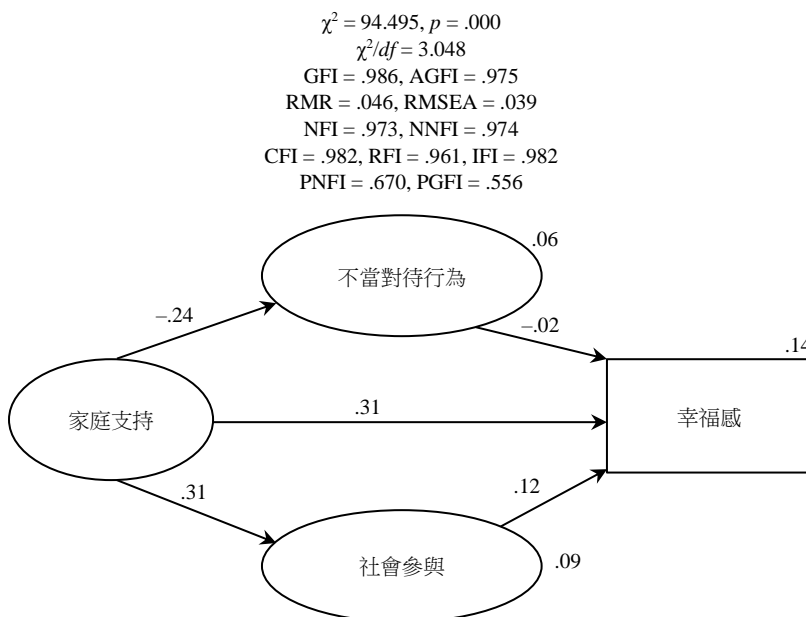
表四：結構模型路徑效果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	B	t 值	β	標準化效果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家庭支持	幸福感	.823	9.648***	.314	.354	.314	.041
家庭支持	不當對待行為	-.068	-6.117***	-.236	-.236	-.236	—
家庭支持	社會參與	.249	8.371***	.306	.306	.306	—
不當對待行為	幸福感	-.181	-0.595	-.020	-.020	-.020	—
社會參與	幸福感	.379	4.019***	.118	.118	.118	—

\*\*\*  $p < .001$

註：B 為非標準化係數，β 為標準化係數。

圖二：結構方程式路徑



### 性別群組比較

為進一步了解不同性別群組在本研究模型當中是否具有恆等性，我們依不同性別群組分別建立兩個子模型，路徑結果如表五所示。其中兩個群組有顯著的路徑都是家庭支持 → 幸福感、家庭支持 → 不當對待行為、家庭支持 →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 幸福感，不同性別在本研究模型中具有恆等性，研究假設 H<sub>4</sub> 成立。從標準化係數 (β) 來比較，不論是女生或男生，影響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都是家庭支持，其次則是社會參與，而不當對待行為對幸福感並不具有預測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不當對待行為 → 幸福感的影響路徑上，女生為正值、男生為負值，該路徑雖未達顯著，但亦顯示此一路徑在女生和男生群組上影響效果不同。最後，家庭支持對不同性別的不當

表五：不同性別群組路徑係數比較

路徑	女生			男生		
	B	t 值	$\beta$	B	t 值	$\beta$
家庭支持 → 幸福感	.90	7.690***	.36	.71	5.722***	.26
家庭支持 → 不當對待行為	-.04	-3.513***	-.23	-.05	-3.142**	-.22
家庭支持 → 社會參與	.29	6.575***	.34	.24	5.660***	.30
不當對待行為 → 幸福感	.85	1.278	.06	-1.25	-1.780	-.11
社會參與 → 幸福感	.34	2.742**	.12	.41	2.922**	.12

\*\*  $p < .01$ , \*\*\*  $p < .001$

註：B 為非標準化係數， $\beta$  為標準化係數。

對待行為都是負向的影響，對社會參與都是正向的影響，顯示家庭對不同性別群組的影響效果是一致的。

## 討論

透過本研究的分析，我們發現家庭支持對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正向影響效果，此一結果與王櫻芬、連廷嘉（2012）、許婷婷、林惠雅（2011）、陳冠妤、陳若琳（2019）、陳憶、陳柯玫（2020）、Flouri & Buchanan（2003）、Love & Murdock（2004）、Webster（1998）的研究結果相同；當青少年獲得愈多家庭支持，其幸福感亦愈好，而且家庭支持在本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因子。

本研究發現家庭支持不僅影響青少年的幸福感，亦會對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產生作用，家庭支持有助於降低不當對待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此與 Daro & Benedetti（2014）、Lepistö et al.（2017）、Prinz（2016）的研究結果一致。而且家庭支持還可促進青少年的社會參與，這亦驗證了 Csikszentmihalyi & Schneider（2000）、Ng et al.（2008）的研究結果；當家庭給予更多鼓勵和支持時，青少年愈有可能從事社會參與活動。由此可知，家庭支持對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家庭應更積極鼓勵青少年參與更多社會活動，而且家庭的支持與否更會決定他們是否願意跨出這一步；為人父母者應給予青少年更多嘗試社會參與的機會，以及更多協助和支持。

若以不同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力來看，從前面分析中可知家庭支持的影響效果最大（.354），社會參與次之（.118），而不當對待行為的影響效果最低（-.020）。進一步依不同性別分析其影響效果，結果如表六所示。依不同性別來看，家庭支持仍然是影響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社會參與，而不當對待行為在不同群組上的影響效果略有不同，女生是正向的效果（.062）、男生是負向的效果（-.107），亦即不當對待行為會對女生的幸福感產生正向影響，但對男生則是負向的影響；

表六：不同性別群組影響效果分析

影響效果	女生			男生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家庭支持 → 幸福感	.390	.364	.025	.322	.263	.059
家庭支持 → 不當對待行為	-.225	-.225	--	-.215	-.215	--
家庭支持 → 社會參與	.344	.344	--	.298	.298	--
不當對待行為 → 幸福感	.062	.062	--	-.107	-.107	--
社會參與 → 幸福感	.115	.115	--	.122	.122	--

註：表格內為標準化數值。

翁敏甄、陳嘉成（2018）的研究中亦有類似發現。此結果顯示男生更容易因為遭受不當對待行為而導致身心受創，這是值得注意之處。

## 結論與限制

在本研究中，家庭支持是指主要照顧者對青少年的讚美和肯定。我們發現，家庭支持會對青少年產生重大的影響，它除了有助提升青少年的幸福感外，亦會對青少年的不當對待行為和社會參與產生影響，家庭支持愈多的青少年會有較多社會參與，亦較不易發生不當對待行為。由此可見，家庭對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力量，家庭的支持和包容是青少年的最終避風港，缺少家庭支持的青少年容易產生心理和行為的問題。

社會參與是另一個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社會參與包括在學校擔任幹部或是透過管道表達意見、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等。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社會參與愈高，他們愈感到幸福，顯示青少年愈來愈熱衷關心自己所居住的環境，亦渴望自己的意見受重視和為人聽見，當家庭給予愈多支持和鼓勵時，他們的社會參與程度就愈高。社會大眾應鼓勵和傾聽青少年表達其意見和想法，尤其是父母要給予更多接納和包容，如此除了有助於青少年願意參與社會、關心社會，更能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受。

本研究發現，不當對待行為對男生的幸福感有負向的影響，由此可見不當對待行為對男生的傷害較大。過去我們對於男生的刻板印象總認為他們應該是堅強、不易遭受打擊的，事實上我們發現，有些不合理的對待對青少年男生會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應重視青少年男生可能會遭受到的不當對待行為，例如被霸凌或是遭受家暴，避免這些事件對其身心產生不良的影響。

整體來說，透過本研究，我們發現台北市青少年的幸福感介於中上（平均得分為 7.55），家庭支持介於「有時這樣」和「常常這樣」之間（平均得分為 3.63），社會參與則介於「很少這樣」和「有時這樣」之間（平均得分為 2.84），不當對待行為以

被霸凌最常發生、遭受家庭暴力最少發生。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台北市青少年的幸福感主要來自於家庭支持，其次則是來自於社會參與。面對新世代的青少年，父母和社會大眾除了給予關心和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接納和包容他們的意見和想法。尤其是近年來出現許多直升機父母、媽寶青少年，某程度亦顯示父母的過度關心和干預；父母對青少年的成長應持開放和支持的態度，鼓勵青少年勇於嘗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如此亦有助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本研究以「2019 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的原始資料進行分析，該調查在抽樣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嚴謹度，足以代表台北市兒少的樣態。但台北市為首善之都，無論是在生活水準、教育資源或福利措施上均優於台灣其他城市，因而本研究的結果是否能推論（或代表）全台灣青少年的樣貌仍有待進一步驗證，這亦是本研究限制之一。此外，如同 Diener（1994）、Gennings et al.（2021）、Ryff & Keyes（1995）所言，幸福感是個多面向的概念，包含主觀和客觀的測量面向，但本研究受限於次級資料，僅能用主觀的測量方法，且以 0 至 10 分來評估整體幸福感，在幸福感的測量上缺乏多面向的評估指標，這是本研究的第二個限制。再者，除了性別的差異可能對青少年幸福感有不同的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同儕支持、校園氛圍或社區環境都可能影響青少年對於幸福感的主觀感受。但本研究受限於次級資料，僅將性別列為調節變項來檢測青少年家庭支持、不當對待行為、社會參與和幸福感的關聯，這是本研究的第三個限制。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其身心健全發展會影響往後的成年人格，特別是在幸福感上的影響更為深遠；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出現，以助提升青少年的幸福感。

## 註釋

1. 測量恆等性 (measurement invariance) 又稱為測量一致性 (measurement equivalence)，是指在不同的樣本群體間具有相等的路徑或參數具有不變性。這種檢測方式常使用在跨文化或性別差異等跨群組的研究當中（詳見陳寬裕、王正華，2018，頁 416）。

## 參考文獻

- 王櫻芬、連廷嘉（2012）。〈青少年社交能力在其人際依附與心理健康間的中介角色探討分析研究〉。《諮商輔導學報：高師輔導所刊》，第 24 期，頁 67–94。https://doi.org/10.6308/JCG.24.03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3）。《2012 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國民幸福指數專刊》。https://ebook.dgbas.gov.tw/public/Data/31211154738MKFOK1MR.pdf

- 吳枚瑛、陳香廷、魯盈謙、洪瑞兒（2018）。〈探討高雄市青少年自覺健康、身體意象及幸福感之關係〉。《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 63 卷第 1 期，頁 33–67。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18.63(1).02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7）。〈2017 社會大眾校園霸凌經驗網路調查報告〉。https://www.cylaw.org.tw/about/advocacy/8/263
- 林惠雅、林麗玲（2008）。〈青少年知覺之家人關係型態與幸福感〉。《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30 期，頁 199–241。https://doi.org/10.6254/2008.30.199
- 翁敏甄、陳嘉成（2018）。〈男女幸福大不同？——父母教養、教師管教與同儕關係品質對不同性別國中生幸福感預測之差異分析〉。《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第 32 卷第 2 期，頁 57–77。
- 教育部統計處（2021）。〈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0A95D1021CCA80AE
- 許婷婷、林惠雅（2011）。〈青少年知覺母親教養行為、母親依附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應用心理研究》，第 52 期，頁 149–179。
- 陳佳汎、陳若琳（2007）。〈雙薪家庭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父母參與、共親職與家庭生活幸福感之相關研究〉。《輔仁民生學誌》，第 13 卷第 1 期，頁 171–187。
- 陳冠好、陳若琳（2019）。〈青少年的家庭共餐、親子依附對家庭生活幸福感之影響〉。《輔仁民生學誌》，第 25 卷第 2 期，頁 1–18。
- 陳寬裕、王正華（2018）。《結構方程模型：運用 AMOS 分析》。五南。
- 陳憶、陳柯玫（2020）。〈家庭關係對弱勢青少年主觀幸福感之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頁 39–58。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2003\_14(1).3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成果報告書》。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U4L3JlbGZpbGUvMTc4NzMvODYxNzM0NS8wYWlwbMTBiYy1jYThlTQ4ZjgtODM0Ni02ZWZWM0MTQ3NjhhZjgucGRm&n=5YyX5biCMTA45bm05YWS5bCR55Sf5rS754uA5rOB6Kq%2F5p%2B15oiQ5p6c5aCx5ZGKLnBkZg%3D%3D&icon=..pdf
- 劉麗芳、陳志賢（2021）。〈青少年生氣情緒表達、幽默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第 15 卷第 1 期，頁 49–78。
-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1）。〈兒童及少年保護〉。https://dep.mohw.gov.tw/DOPS/np-1232-105.html
- 鄧清如、陳昭儀（2010）。〈國中生社團參與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北縣一所國中為例〉。《教育心理學報》，第 41 卷第 4 期，頁 703–732。https://doi.org/10.6251/BEP.20090226
- Ang, S. (2018).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ortality among older adults in Singapore: Does ethnicity explain gender differenc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73(8), 1470–1479.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w078
- Bennett, I. M., Chen, J., Soroui, J. S., & White, S. (2009). The contribution of health literacy to disparities in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and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s in older adults.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7(3), 204–211. https://doi.org/10.1370/afm.940

- Bharara, G., Duncan, S., Jarden, A., & Hinckson, E. (2019). A prototype analysis of New Zealand adolescents' conceptualizations of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9(4), 1–25. <https://doi.org/10.5502/ijw.v9i4.975>
- Bjarnason, T., Bendtsen, P., Arnarsson, A. M., Borup, I., Iannotti, R. J., Löfstedt, P., Haapasalo, I., & Niclasen, B. (2012).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ldren in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36 Western societies. *Children and Society*, 26(1), 51–62. <https://doi.org/10.1111/j.1099-0860.2010.00324.x>
- Boarini, R., Comola, M., Smith, C., Manchin, R., & de Keulenaer, F. (2012). *What makes for a better life? The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ECD countries —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OECD Statistics Working Papers 2012/03).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9b9ltjm937-en.pdf?expires=166366775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EF4B99DDBADF21DDB110F9FFDFBCBCC3>
- Bowling, A. (2017). *Measuring health: A review of subjective health,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scales* (4th e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yko, C., Coulton, C., & Cooper, R. (2017). *The little book of wellbeing: A guide to wellbe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 Lancaster University.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6), 723–742.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2.6.723>
- Child Family Community Australia. (2017).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https://aifs.gov.au/resources/policy-and-practice-papers/risk-and-protective-factors-child-abuse-and-neglect>
- Courtin, E., & Knapp, M. (2017).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in old age: A scoping review.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5(3), 799–812. <https://doi.org/10.1111/hsc.12311>
- Csikszentmihalyi, M., & Schneider, B. (2000). *Becoming adult: How teenagers prepare for the world of work*. Basic Books.
- Daro, D., & Benedetti, G. (2014). Sustaining progress in 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 A transformative challenge. In J. E. Korbin & R. D. Krugman (Eds.), *Handbook of child maltreatment* (pp. 281–300). Springer.
- DeNeve, K. M., & Cooper, H. (1998). The happy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2), 197–22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4.2.197>
- Diener, E. (1994). 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1(2), 103–157. <https://doi.org/10.1007/BF01207052>
- Dodge, R., Daly, A. P., Huyton, J., & Sanders, L. D. (2012). 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2(3), 222–235. <https://doi.org/10.5502/ijw.v2i3.4>



- Dunlop-Bennett, E., Bryant-Tokalau, J., & Dowell, A. (2019). When you ask the fish: Child wellbeing through the eyes of Samoa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9(4), 97–120. <https://doi.org/10.5502/ijw.v9i4.1005>
- Erikson, E.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orton.
- Erikson, E. (1987). The human life cycle. In S. Schlein (Ed.). *A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Selected papers from 1930 to 1980 by Erik H. Erikson* (pp. 595–610). Norton.
- Erikson, E. H. (1994).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W. W. Norton.
- Fattore, T., Mason, J., & Watson, E. (2007). Children's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ir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0(1), 5–29.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06-9019-9>
- Fletcher, A. C., Elder, G. H., Jr., & Mekos, D. (2000). Par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involvemen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0(1), 29–48. [https://doi.org/10.1207/SJRA1001\\_2](https://doi.org/10.1207/SJRA1001_2)
- Flouri, E., & Buchanan, A. (2003). The role of father involvement and mother involvement i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3(3), 399–406. <https://doi.org/10.1093/bjsw/33.3.399>
- Foley, K. R., Blackmore, A. M., Girdler, S., O'Donnell, M., Glauert, R., Llewellyn, G., & Leonard, H. (2012). To feel belonged: The voices of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disabilities on the meaning of wellbeing.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5(2), 375–391. <https://doi.org/10.1007/s12187-011-9134-2>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https://doi.org/10.1177/002224378101800104>
- Gennings, E. K., Brown, H. J., & Hewlett, D. (2021). Constructing a definition: Adolescent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ld and expe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11(1), 69–88. <https://doi.org/10.5502/ijw.v11i1.1461>
- Gillett-Swan, J. K. (2014). Investigating tween children's capacity to conceptualise the complex issue of wellbeing.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4(2), 64–76. <https://doi.org/10.2304/gsch.2014.4.2.64>
- Gilmour, H. (2012).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anadian seniors. *Health Reports*, 23(4), 23–32.
- Glass, T. A., De Leon, C. F. M., Bassuk, S. S., & Berkman, L. F. (2006). Social engageme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ate life: Longitudinal findings.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18(4), 604–628. <https://doi.org/10.1177/0898264306291017>
- Goll, J. C., Charlesworth, G., Scior, K., & Stott, J. (2015). Barriers to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lonely older adult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ears and identity. *PLOS ONE*, 10(2), Article e0116664.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6664>
- Goodman, F. R., Disabato, D. J., Kashdan, T. B., & Kauffman, S. B. (2018). Measuring well-being: A comparis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ERMA.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3(4), 321–332.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7.1388434>

- Graney, M. J., & Zimmerman, R. M. (1981).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ealth self-report variations among older peopl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2(4), 291–300. <https://doi.org/10.2190/D3A2-F554-JWWH-GXBD>
-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5th ed.). Prentice hall.
- Helliwell, J. F., & Putnam, R. D.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1449), 1435–1446. <https://doi.org/10.1098/rstb.2004.1522>
- Henry, J. W., & Stone, R. W. (1994).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end-user satisfaction with a computer-based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7(3), 21–33. <https://doi.org/10.4018/irmj.1994070102>
- Hertzog, C., Kramer, A. F., Wilson, R. S., & Lindenberger, U. (2008). Enrichment effects on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 Can the functional capacity of older adults be preserved and enhanced?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9(1), 1–65. <https://doi.org/10.1111/j.1539-6053.2009.01034.x>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Huppert, F. A., & So, T. T. C. (2013). Flourishing across Europe: Application of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fining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0(3), 837–861.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1-9966-7>
- Julien, D., Gauvin, L., Richard, L., Kestens, Y., & Payette, H. (2013). The rol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alking in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Results from the VoisiNuAge study. *Canadian Journal of Aging*, 32(1), 1–12. <https://doi.org/10.1017/S071498081300007X>
- Kapteyn, A., Smith, J. P., & Van Soest, A. (2009). *Comparing life satisfaction* (RAND Working Paper WR-623-1). <https://doi.org/10.7249/WR623-1>
- Kelly, C. (2018). “I need the sea and the sea needs me”: Symbiotic coastal policy narratives for human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UK. *Marine Policy*, 97, 223–231.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8.03.023>
- Kessler, E.-M., Schwender, C., & Bowen, C. E. (2009). The portrayal of older people’s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German prime-time TV advertisement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5B(1), 97–106. <https://doi.org/10.1093/geronb/gbp084>
- Kline, T. J. B. (2005). *Psychological testing: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design and evaluation*. Sage.
- Lepistö, S., Ellonen, N., Helminen, M., & Paavilainen, E. (2017). The family health, functioning, social support and child maltreatment risk of families expecting a baby.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6(15–16), 2439–2451. <https://doi.org/10.1111/jocn.13602>

- Lijadi, A. A. (2018).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outline human well-being: Metaanalytic literature review for defining empowered life years* (IIASA Working Paper WP18-002). <https://pure.iiasa.ac.at/id/eprint/15119/1/WP-18-002.pdf>
- Love, K. M., & Murdock, T. B. (2004).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 examination of young adult college students in intact families and step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4), 600–608.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18.4.600>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396. <https://doi.org/10.1037/h0054346>
- May-Chahal, C. (2006). Gender and child maltreatment: The evidence base. *Social Work and Society, 4*(1), 53–68.
- McDonald, R. P., & Ho, M. H. R. (200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repor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1), 64–82.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7.1.64>
- Mulaik, S. A. (2009). *Linear causal modeling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s*. CRC Press.
- Ng, I. Y. H., Ho, K. W., & Ho, K. C. (2008). The role of families in shaping youth soci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dx.doi.org/10.2139/ssrn.1105270>
- NHS Digital. (2018).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England, 2017: Multiple conditions and wellbeing*. <https://files.digital.nhs.uk/95/AC12EC/MHCYP%202017%20Multiple%20Conditions.pdf>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How's life? 2013: Measuring well-being*. <https://www.oecd.org/sdd/3013071e.pdf>
- Paavilainen, E., Åstedt-Kurki, P., Paunonen-Ilmonen, M., & Laippala, P. (2001). Risk factors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in the family: Towards a knowledgeable base of family nur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38*(3), 297–303. [https://doi.org/10.1016/S0020-7489\(00\)00074-2](https://doi.org/10.1016/S0020-7489(00)00074-2)
- Pavlova, M. K., Silbereisen, R., & Sijko, K. (2014).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Poland: Links to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risky alcohol consump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7*(1), 29–44.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3-0332-9>
- Prinz, R. J. (2016). Parenting and family support within a broad child abuse prevention strategy.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51*, 400–406.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5.10.015>
- Putnam, R. D. (2001).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and Schuster.
- Ryan, R. M., & Deci, E. L. (2001).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41–16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2.1.141>
- Ryff, C. D., & Keyes, C. L. M. (1995).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4), 719–72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9.4.719>

- Schumacker, R. E., & Lomax, R. G. (2004).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nd ed.). Psychology Press.
- Seligman, M. E. P. (2002). *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 Atria.
- Seligman, M. E. P. (2011).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Atria.
- Takahashi, K., Nguyen, T. M. T., Poudel, K. C., Sakisaka, K., Jimba, M., & Yasuoka, J. (2011).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persons with musculoskeletal impairments in Hanoi, Vietnam. *BMC Public Health*, *11*, Article 206. <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1-206>
- 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2008). *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Making the most of ourselves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project repor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92450/mental-capital-wellbeing-report.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92450/mental-capital-wellbeing-report.pdf)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2021). *Child maltreatment 2019*. <https://www.acf.hhs.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b/cm2019.pdf>
- United Nations. (2019). *Goal 3: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ealth/>
- Webster, J. D. (1998). Attachment styles, reminiscence functions and happiness in young and elderly adult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2*(3), 315–330. [https://doi.org/10.1016/S0890-4065\(98\)90006-8](https://doi.org/10.1016/S0890-4065(98)90006-8)
- Yamaoka, K. (2008).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East Asi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6*(4), 885–899.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7.10.024>
- Yeary, K. H. C. K., Ounpraseuth, S., Moore, P., Bursac, Z., & Greene, P. (2012). Religion,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54*(3), 331–347. <https://doi.org/10.1007/s13644-011-0048-8>
- Zhang, Z., & Zhang, J. (2015).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etirees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3*(1), 143–160.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4-0728-1>

### 附錄：各面向各題目得分摘要

構面／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b>一、家庭支持</b>	<b>1</b>	<b>5</b>	<b>3.63</b>	<b>0.92</b>
家庭支持 1：主要照顧我的人會稱讚我	1	5	3.40	1.03
家庭支持 2：主要照顧我的人在我犯錯時會跟我討論	1	5	3.70	1.10
家庭支持 3：主要照顧我的人會讓我表達我的意見	1	5	3.80	1.08
<b>二、不當對待行為</b>	<b>1</b>	<b>5</b>	<b>1.05</b>	<b>0.26</b>
不當對待 1：被霸凌	1	5	1.06	0.39
不當對待 2：被性騷擾	1	5	1.05	0.36
不當對待 3：遭受家庭暴力	1	5	1.03	0.27
<b>三、社會參與</b>	<b>1</b>	<b>5</b>	<b>2.84</b>	<b>0.99</b>
社會參與 1：我有擔任幹部或志工（班級、學校或校外）	1	5	3.55	1.23
社會參與 2：我會透過公共事務管道表達意見	1	5	2.68	1.21
社會參與 3：我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倡議活動、遊行、 連署、集會	1	5	2.30	1.22
<b>四、幸福感</b>	<b>0</b>	<b>10</b>	<b>7.55</b>	<b>2.01</b>

## **Family Support and Well-being of Taiwan Adolescence: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Youth Maltreat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With Gender**

Yang SHIH & Nai-Lin W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youth maltreat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adolescents' well-being with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used the data from the Taipei Cit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in 2019 for analysis, with family suppor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youth mistreat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adolescents' well-being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gender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amily suppor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ffect adolescents' well-being; however, youth maltreatment has no effect on their well-being. There are no gender differences within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Keywords: adolescents; well-be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family support; gender difference*

---

**SHIH, Yang** (石泐)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Chien University.  
**WANG, Nai-Lin** (王乃琳)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Chien University.